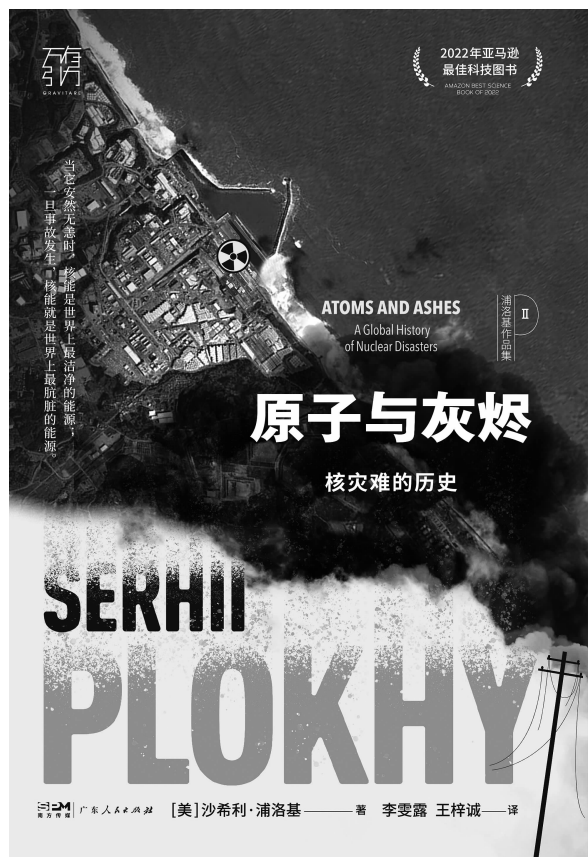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嘉幸照十分担心会发生事故



《原子与灰烬：核灾难的历史》
[美]沙希利·浦洛基 著 李雯露 王梓诚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

1961年3月，在东京以北约120公里处，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岛东海岸的东海村附近，建造了一座装机容量为166兆瓦的反应堆。反应堆于1965年11月达到临界状态，于次年7月并网。广岛和长崎核爆发生的近20年后，日本拥有了自己的核工业。日本首座商用反应堆使用了英国的石墨反应堆技术，但此次合作十分短暂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美国发起了销售攻势，将英国挤出了日本市场——美国反应堆的造价更便宜，发电能力更强。东海村的第二座反应堆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供货，于1978年11月并网。

通用电气公司卖给日本反应堆是最早由芝加哥大学阿贡国家实验室(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)研发的沸水反应堆(Boiling Water Reactors, 简称BWRs)。对比三哩岛核电站运行的里科弗式压水反应堆，二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沸水反应堆的构造更简洁。三哩岛的压水反应堆有两套冷却系统，或称冷却回路，一回路使用的是加压的水，二回路使用的则是普通的水。加压水在反应堆堆芯内加热，将热量传递给二回路中的水，产生蒸汽以驱动涡轮机。沸水反应堆则只有一个冷却回路——反应堆将通过堆芯的水变为蒸汽，驱动涡轮机运转。

三哩岛核电站的混凝土安全壳曾避免事故升级为更严重的核灾难，设计简洁的沸水反应堆则无须建造这一类型的安全壳，从而节省了大量的建造费用。事实上，为沸水反应堆建造三哩岛式的混凝土安全壳也不现实：为了简化建造程序，去除大量不必要的管道，设计师在反应堆容器上部安装了汽水分离器和蒸汽干燥器，这使得反应堆的高度达到了18米。切尔诺贝利和苏联其他核电站的RBMK之所以无法建造安全壳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。不过，为了确保沸水反应堆的安全性，设计者将反应堆放置在2.5厘米厚的“马克I型”(Mark I)钢制安全壳中。这种安全壳在性能上曾存在重大缺陷，他们改进了设计，认为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
相较于西屋电气公司在日本市场主打的压水反应堆，通用电气公司的沸水反应堆建造更简单，造价更低廉。两家公司在日本展开了销售竞争，通用电气公司的优势在于起步早、价格低。1963年11月，在东京以西约322公里的日本海海岸，敦贺核电站开始建造第一座由通用电气公司研发的商用沸水反应堆；1970年3月，该反应堆达到临界状态。1967年2月，相隔不远的美滨核电站开始建造另一座沸水反应堆；1970年11月，该反应堆并网。当时日本的电力产业正在蓬勃发展，如果有人想要选择核能，那么通用电气公司的沸水反应堆是不二之选。1970—2009年，日本共建造了30座沸水反应堆和24座压水反应堆。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是日本首批建造并运行

通用电气公司沸水反应堆的核电站之一。1967年7月，该核电站6座反应堆中的第一座于本州岛太平洋海岸、东京东北方向约225公里的大熊町和双叶町之间的位置开始建造。1971年3月，第一座反应堆实现并网，这对福岛县政府来说无疑是喜事一桩。自1958年起，福岛县政府就开始游说，力争在该地区建造核电站，以促进当地的经济。日本最大的民营电力企业东京电力公司(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, 简称东电或TEPCO)同样十分欣喜，因为福岛沸水反应堆是它冒险进入核工业领域的初步尝试。

福岛第一座沸水反应堆的总装机容量仅为460兆瓦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到1979年10月，福岛第一核电站又建造了5座反应堆，其中功率最大的反应堆总容量达到了1000兆瓦。核电站总功率达到了4700兆瓦电力，发电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排到第15位。1981—1986年，东电在附近的福岛第二核电站建造了4座沸水反应堆；在接下来的10年间，又在全球最大的核电站——柏崎刈羽核电站建造了6座沸水反应堆。日本需要更多的电力，东电能够承担供电的重任。

将通用电气公司的核技术带到福岛，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，名嘉幸照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核工程师，后来又出任一家公司的社长——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东京电力公司的承包商。同他的祖国日本一样，对于美国的核技术，名嘉幸照也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抗拒到最终接纳的转变，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曲折。名嘉幸照生在一个渔民家庭，从小在冲绳岛长大，其间参与过学生运动，反对美国在岛上驻军并部署核武器。有了这些经历之后，他决心离开冲绳。后来，他成为一名海军工程师，在世界各地漂泊。一位前美军核潜艇艇员劝说他到通用电气公司工作。名嘉幸照决定试一试，便接受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培训，成为一名沸水反应堆操作员。

1973年，名嘉幸照来到了东电管理的福岛第二核电站。“我把一本通用电气公司的培训手册译成了日文，这也是东电沸水反应堆培训中心的第一本培训手册。”名嘉幸照回忆道。“见识过世界各地的情况后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我相信，对于资源贫瘠的日本来说，核能是唯一能源。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。”但在东电工作期间，注意到公司的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他回忆说：“在20世纪70年代，有很多东电的工程师都在核电站厂区工作。”他很喜欢和管理层一起开会或讨论，一名公司副社长还经常来厂区视察。但后来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”名嘉幸照回忆道，“东电就将核电站的运营交给了承包商和制造商。显然，他们认为只有管理效率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。”

不过，最大的变化是对待反应堆安全的态度。就像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氛围一样，对他们来说，完成生产目标要优先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。名嘉幸照记得，1988年底，一个水泵的叶轮叶片发生了破裂，使得一片金属落入了反应堆堆芯，水泵的振动也更加剧烈。于是，名嘉幸照建议管理层降低输出功率。“有人告诉我，现在正值年底，降低输出功率是不可能的。”他回忆道。管理层关心的是完成年度生产目标。名嘉幸照十分担心会发生事故，甚至一度失眠，直到1989年1月反应堆停堆他才如释重负。这座反应堆经过大半年的维修，在反核活动家和当地反核支持者的抗议声浪中重新启动。在与抗议者的见面会上，负责该反应堆的主管竟然中途退出了会议。“我们……被宠坏了，因为我们掩盖了事故信息，逃避了来自公众的压力。”名嘉幸照回忆道。

2002年，一则重磅丑闻曝光，称东电员工早在1977年就开始伪造安全报告，没有进行安全检测就提供虚假信息，还在报告中掩盖存在的问题，虚假报告的次数不下200次。东电的会长、社长和一名副社长被迫辞职。对此事的内部调查由62岁的高级主管胜俣恒久负责。调查结束后，他升任东电的社长。以思维敏锐著称的胜俣稳步升至公司领导层，于2008年从社长升任会长。

胜俣和新任社长清水正孝一道竭尽全力整顿公司，完善安全标准和企业文化。东电旗下的反应堆经历了更多次的停堆检查，这明确地表明公司渴望洗心革面、重新开始。2007年，东电管理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因地震而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；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发出警告，声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不符合新的抗震安全标准。作为回应，2010年，胜俣和清水正孝建立了一个应急控制中心，可在重大地震灾害中充当应急指挥部。

一本关于勇气的书



「美」杨瑞珠、艾伦·米勒林、马克·布雷根著
《当阿德勒谈勇气》
上海三联书店
花莹莹译

内容简介

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故事，只会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吗？哈佛大学乌克兰讲席教授沙希利·浦洛基继《切尔诺贝利》之后，再度审视核能问题，试图从历史上六起标志性的核事故中寻找核灾难的根源。他以细致严谨的调查，分析了六起事故的技术和人为因素；以文学化的笔调，再现了惊心动魄的灾难过程；以史学家的关怀，将事故中的各色人物置于历史情境中予以观照，展现了政府、核工业从业者、媒体和民众在辐射阴影笼罩下的种种情态；更以学者的敏锐，探寻事故之外，真正值得关注的政治、社会与文化因素。

作者

[美]沙希利·浦洛基 (Serhii Plokhyy)

哈佛大学历史系乌克兰史米哈伊洛·赫鲁舍夫斯基席洛教授、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，专攻东欧思想、文化、国际关系史，著有《大国的崩溃：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》《欧洲之门：乌克兰2000年史》《切尔诺贝利：一部悲剧史》等十余部专著，获奖众多，包括非虚构类两大标杆奖项莱昂内尔·盖尔伯奖与贝利·吉福德奖，以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权威奖项普希金图书奖，他也是唯一两获普希金图书奖的获奖者。

内容简介

本书以阿德勒心理学为基础，讨论勇气到底是什么，帮助我们了解人生任务的内核运行逻辑，面对人生任务时我们的内心与行动是什么样的，勇气如何发挥作用，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心理暗示、心理揭示、内心定向等心理学方法与工具激发勇气，从而获得幸福。

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勇气的书？明明已经有很多书籍讲述如何更好地生活，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？关于幸福的人生，我们到底理解多少？它现实吗？要如何实现？什么是勇气？我们如何获得勇气、赋予勇气？当我们面对生活的诸多要求时，心理学如何帮助我们追寻勇气？

从冷漠到敌意

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二十世纪的社会问题描述为冷漠。当时的人们深陷恐惧和焦虑之中，于是退缩到一种麻木(无情)的状态，无法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感情。以“别管闲事”和“无所谓”为主题的人生态度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，这种无声而压抑的冷漠逐渐转化为对自己和他人的敌意。几十年前，鲁道夫·德雷克斯曾如此描述这种黯淡的生活景象：

人类，博学至此，却仍然对社会生活的某些基本要求一无所知。他们在家里无法安然生活，也不知道如何养育自己的子女。他们只能饮酒作乐，或者唯有在盲目追求、疯狂获取以及取得成就的过程中才能感受到人生的乐趣。无私的爱逐渐成为消逝的艺术，一切信仰都被视为陈旧过时，关系业已成为幻想一场。

如今，生活问题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糟糕，恐惧支配着我们在家庭、学校、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思想、感受与行动。随着新年的到来，公共犯罪和破坏行为在区域范围和全球范围内激增，这令我们深信自己再也无法从容地生活在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上，活出幸福的人生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。

与此同时，当今社会崇尚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，我们对既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理解变得模糊不清、充满矛盾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很难再找到有利于个人发展和调整的社区支持系统。我们不得不孤军奋战。身处孤独的情感和社交世界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驱使之中。

对于社会关系的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的需要，令我们越来越难以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，而这原本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。那些出于良好的初心努力追求美好人生的人，纷纷沦为竞争和比较的牺牲品。我们意识到人生并不完美，竞争和比较就成了破坏性感受的滋生地。人人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这一设想和主张，与盛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现象直接相关。

从恐惧到勇气

为了增进个人幸福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让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归属感和价值感，我们肩负着重重挑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讨论社会生活的勇气尤为必要。在心理学文献中，勇气常常被忽视。接续在“科学世纪”之后的二十世纪也被称为“恐惧的世纪”以及“心理学的世纪”。心理学诞生于一个混乱的时代，之前的社区价值观正被基于自然科学的价值观所取代，因此心理学也难逃被二十世纪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支配的命运。心理学的初衷是促进人文关怀，却以失败而告终。与此相反，心理学一直以来过于关注对恐惧的分析，却忽视了对恐惧的另一面——勇气的培养。

没有精神疾病并不意味着心理健康。仅仅关注精神疾病的存在与否，这对于心理学而言尚嫌不够。人类远比一切心理学理论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坚韧得多。即便身处恶劣的生存环境，我们依然能够以最佳方式应对并获得最优发展，这才是健康的最好体现。